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 日本专门职业大学制度的分析及启示

王梅¹, 马晓晴¹, 袁婷²

(1.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4;2.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摘要:基于多源流理论对日本专门职业大学制度展开分析,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少子化老龄化现象、高职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现状等使得有关议题进入政策视野,形成问题源流,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推动形成“政策原汤”,社会人士集体诉求和历来政府的引导形成坚实的政治源流,最终三大源流汇聚,通过修正《学校教育法》开启了专门职业大学的“政策之窗”。借鉴日本经验做法我国未来发展高职教育应搭建职教人才培养立交桥,打好职教课程新底色,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贯通国民教育两维度。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日本;专门职业大学;多源流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0)0021-0039-07

近年来,我国正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步伐,职教20条、“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百万扩招”背景下,中国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着种种机遇与挑战。作为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近邻,在崇尚学历、以文凭为主要评价尺度的日本社会,职业教育也常常被视为“次等教育”“二流教育”,^[1]职业教育缺乏应有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受到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危机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日本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鼎力助推,在日本高职教育机构功能缺位的现实条件下,2019年专门职业大学作为日本高职教育时隔55年来的新创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该制度被纳入学制框架中,致力于培养理论与实践兼备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

才,被视为推动日本职教体系现代化的坚实举措。本研究运用多源流理论研究日本专门职业大学制度的形成缘起,以期探讨日本高职教育发展势态,从而对我国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益思路。

一、问题缘起:高职教育改革走向常态化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大专科层面的高职教育的发展力度,高职教育在规模和质量上得到有力提升。2010年起发展技术应用性本科教育开始进入国家政策视野,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到2022年,一

收稿日期 2020-05-04

基金项目 2016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价值共创与共享 天津在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TJGL16-017,主持人:袁婷)

作者简介:王梅(1978—),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马晓晴(1996—),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袁婷(1981—),女,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教育。

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2]的目标。同年4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出台,要求“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3],因此,推进高职教育改革,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面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探索中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一方面,如何将政策目标落到实处,办成什么样、办什么专业的高职教育尚需要系统的考虑和相应的政策、标准与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是从中职升格或普通专科转型而来,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之间如何打破体制的隔阂实现有效衔接,如何对进入高职教育的不同类型生源进行有效培养,如何规避人才培养的同质性以及充分发挥高职教育特色等成为未来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时必须回答的问题^[4]。

实际上,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十分注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学习日本实业教育而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到兴起美国实用主义和职业教育思潮,再到效仿苏联强化中等层次技工教育,在国际借鉴与本土探寻中我国职业教育获得显著发展。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职教模式成为国际公认的三大典范之一,当前其提供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类型包括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等,2019年起一种全新类型的高职教育机构——专门职业大学开始正式面向社会招生。与我国同属“学历社会”下的日本高职教育如何变革,专门职业大学又缘何产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无疑对新时期我国发展高职教育带来启示与借鉴。

二、理论依据:多源流理论的内涵与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分析的关注焦点逐渐从政策评价转移到政策议题的形成过程中,并形成了几种政策分析方法和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分析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多源流理论。1984年,美国公共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出版《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提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概念,形成系统化的“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Theory)。

金登认为,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

策议题,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之前要经历一个“问题——公共问题——政策问题”的过程,问题源流是问题的识别、界定和引起重视的过程,是政策问题成功建构的第一步^[5]。金登提出有三种可以将实际情况定义为“问题”的方法,一是通过相关重要指标反映的某一现象或情况;二是一些重大事件或者危机;三是从现行项目实施中得到的反馈。随着“问题源流”的不断汇集,政治系统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政策主张,形成“政策原汤”。金登认为,一个主题要被推上决策议程,仅有问题还不够,还需附上行得通、被软化过、经拟定的解决方案^[6],即政策源流恰是由不同利益相关主体通过展开博弈来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促使不同的观点不断碰撞。政治源流主要是指政治对于政策议程具有促进或抵制作用,主要包括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更迭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强烈的国民情绪和政府权力的更迭二者结合,会对政策出台产生强有力的影响^[7]。三条源流不断发展,在某一关键时间点实现汇合后“政策之窗”便得以打开,相关政策制定或改革便开始启动。简言之,多源流理论框架是在对政策议程的“黑箱”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对研究公共政策的出台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对于理解公共政策发展变革 also 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多源求索:专门职业大学制度的形成分析

专门职业大学的创立是近年来日本政府对本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次改革完善,其产生背后受多种力量支持和牵引。因此,运用多源流理论能够有力地解释这一制度是如何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进而如何上升为政策议程并最终得以成型。

(一)专门职业大学产生的动力源:问题源流

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的新要求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扶持,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在“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指导下拉开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序幕^[8],到1970年,日本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主要产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9]。但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瓦解以来,日本进入经济减速的低迷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值,纵使政府采取了多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无法使日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水平,久久徘徊在“失

去的30年”阴影中的日本已经无法续写“技术立国”指导下的制造业神话。据日本总务省调查报告显示,1994年日本服务业从业人数已超制造业,制造业从业人数在1992年达到1 603万人(占整体从业人数的25%)的峰值之后便开始下降,2017年日本第二产业就业人口降至23.3%,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持续扩大至70.1%^[10]。随着日本学者藤原洋《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的出版,日本社会展开了关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讨论,书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用信息技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革命”^[11],以人工智能(AI)、大数据(BD)、物联网(IOT)、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势必对日本社会变革、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与影响,这也使它被视为日本实现经济重振与逆袭的转折点。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日本各行业正大大增加对专业型、技术型及服务型行业的人才需求,同时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标准。挑战精神与创新意识、信息收集与数据分析能力等成为劳动者适应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基本要求,人才能力结构的新变化客观上要求当前日本教育制度积极响应,尤其是需要大力发挥职业教育在培养兼备专门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职业技术人才上的重要作用。

2. 少子化、老龄化引发的社会危机

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持续已久,正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每日新闻》曾发表社论指出,2025年开始日本将迎来真正的人口危机,届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急剧增加,到2042年平均每2.8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日本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相伴而生,2018年日本未满15岁的儿童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2.19%,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67%,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到13.92%,75岁以上超老龄人口占比到达14.22%^[12]。

少子化老龄化问题首先将直接导致适龄劳动力供给不足,2017年厚生劳动省“高龄者的雇佣情况”(高齢者の雇用状況)报告中显示,有84.1%的企业会继续雇佣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另有预测显示,AI等技术应用可以代替约49%的日本劳动人口^[13]。此外,日本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也将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影响,在青少年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

下,私立学校濒临破产、校际生源竞争加剧、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平衡等问题将导致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良莠不齐、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高等教育需要勇于肩负自身使命,自觉回应经济社会要求。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服务产业、面向市场,以独立的教育内涵、办学定位和教育目标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为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具有普通本科教育无法替代的地位,可以说,发展高职教育成为日本直面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和构建超智能社会的重点工程。

3. 高职机构人才培养的现实桎梏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5%,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一个由精英阶段迈入大众化阶段的国家^[14],2014年日本大学升学率超过了50%,若将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统计在内则能达到80%^[15]。在这一背景下,学生的资质和需求往多样化方向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破除同质化,应时顺势做出改变。

当前,日本初、高中毕业生有多种进入职业教育的升学选择,就高职教育来看,各类型学校在提供职业教育时扮演着不同角色。短期大学主要依托地方办学,且修业年限较短,难以应对全方位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的需求。高等专门学校接收初中毕业生,其主要特点是将中等教育后半段与高等教育衔接,所以无法大规模接收高中毕业生。专门学校在制度设计上虽是以培养职业性和实践性技术能力、进行多样化职业教育为目标,但实际上这类学校并未有严格的教师配置和教育设施标准,另外,专门学校也未形成制度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因此专门学校也不能完成高质量培养专门职业人才的任务^[16]。除此之外,更高一级的职业教育机构由各政府机关自设,如“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气象大学”等,仅有与国家资格制度密切相关的某些医学领域才开设有更高水平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由此可见,在日本教育体系内,被明确写进法律条文、与大学具有同等地位且可以授予学位的职业教育机构是缺失的。

(二)专门职业大学产生的可能性:政策源流

1. 多部门积极提供技术路线支持

日本筹备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念头早在201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中就有萌发,后于2014年

7月日本政府的教育再生实行会议上再次提出。教育再生会议最早于2006年由第一次安倍内阁设置,目的是以首相直属机构的形式研究教育改革问题,谋求教育再生,推进教育之根本改革^[17]。2014年的教育再生实行会议以“关于今后学制等的讨论”(今後の学制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为主题,指明了“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构建制度化职业教育体系,开展高质量的实践性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要求未来高职教育应根据社会需求改善教育内容和学科结构,培养多领域的实践技术型人才^[18]。

此后,各个部门陆续发表报告提出了技术性人才的需求。2016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新产业结构愿景》^[19],提出“工业4.0”将引发产业与就业结构变革,报告指出,预计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影响下,2030年传统制造业将减少297万个岗位,而高端服务业将增加197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构建新的适应“工业4.0”需求的教育系统刻不容缓。同年8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未来工作2035:为了人人出彩》,报告指出,受工业4.0影响,未来日本劳动方式将向多样化、灵活化方向发展,为所有人提供实践性的生涯职业教育成为必然^[20]。结合各政府部门的议案,2016年在中央教育审议会上对相关制度设计进行了设想,开展理论与实践兼备的职业教育,“高度专门化”“强化实践能力”“精通多领域”“强化综合能力”^[21]成为新教育机构的培养目标。

2. 产业界热切呼唤高水平技术人才

除了学校职业教育以外,企业内的职业培训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企业内职业培训并不局限于技工和管理者培训,而是从新入职的员工教育开始,到骨干员工、中层管理者以及经营者等的一贯培训^[22]。20世纪50年代日本企业内教育就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23],1958年日本政府颁布《职业训练法》,制定了企业培训的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内职业教育的发展。日本现行企业职业培训主要有3种模式:一是OJT(On the Job Training),以企业为主导的在岗职业培训;二是OFF-JT(Off the Job Training),以企业为主导,暂离工作岗位的离岗职业培训;三是自我启发,以员工为主导,根据自身职业生涯规划进行的自主职业能力开发^[24]。在学徒制传统和终身雇佣制度的有力支撑下,企业职业教育为日本社会培养出大量

掌握实际技能的人才,也使日本企业成为国家创新能力开发的重要驱动。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再加上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企业难以继续提供“终生雇用”的承诺和保障,这直接导致了企业中非正式员工数量增加。由于非正式员工的离职率相对较高,培训成本较大,因此企业大大减少了教育培训。20世纪90年代后,实施OJT和OFF-JT的企业一度从90%下滑到50%,员工自我启发式职业能力开发逐渐成为企业开展职业培训的首选^[25]。

毋庸置疑,信息化与智能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增强对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使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被替代,由于企业职业培训逐渐萎缩,所以未来单靠企业去培养技术工人和进行人力资源开发较为困难,这在客观上驱动了日本各类高职学校加大实践技能性人才的培养,使学校职业教育在高层次实践技术人才培养上凸显更核心功能。

(三)专门职业大学产生的可行性:政治源流

1. 社会人对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产生诉求

一方面,现如今日本有许多学生茫茫然升入大学,他们在大学期间也未能培养起职业意识与能力,导致自身条件与职业岗位和社会需求不匹配,继而引发社会出现青年群体高失业、高离职甚至不就业的现象。日本社会各界提出在大学阶段需要更加关注学生职业性发展与职业选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职业观念。因此,通过实践性职教课程或项目培养学生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职业素质是日本新设专门职业大学制度的内在考量。

另一方面,面对一轮产业革命的冲击,日本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与职业观呈现多样性,个体职业变化周期缩短、劳动时间延长、失业恐慌加剧,社会人士需要更通畅的继续学习渠道来掌握更高水平的技术知识。正如有日本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应该贯穿青年期到成人期的教育全过程”^[26],让职业教育冲出学校围墙,创办让社会人士更容易接受继续教育的机构以推动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切实将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成为日本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简言之,日本将专门职业大学设置在大学框架内不只是停留在促进职业教育高等化上,更深刻的意涵在于贯通教育全过程,满足学生对继续

教育的需求,为打造终身教育社会提供支撑。

2. 历来行政力量的引导与认同

在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直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产生。起初,职业教育机关由工部和内务省管辖,以培养支撑“殖产兴业”的人才为己任,因此,其首先在工科进行且着重发展程度较低的工业技术教育。随着20世纪初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企业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专门管理人员、中层领导和各级技术人员的需求逐渐增加,政府积极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数量,出台《学制》《实业学校令》《专科学校令》等一系列法律条令,使得20世纪初期职业教育开始在普通教育以外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二战后,《教育基本法》开始实施,日本政府统一将一批大学改为新制大学,把另一部分不符合新制大学设置要求的专门学校编为短期大学,因此,始建于1950年的短期大学被国内学者看作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发端。此时,发展职业教育承担着提高国民经济和改善国民生活的重要任务,1951年颁布《产业教育振兴法》(産業教育振興法)后,开启了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篇章。此后,日本又出台建设高等专门学校的法案,3年中等普通教育与2年高等职业教育叠加起来的高等专门学校以“教授精深的专门学艺,培养职业所必须之能力为目的”^[27],成为日本高职教育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1975年《学校教育法》修订后,专门学校也被确定具有高等教育的地位,自此,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完成。但如前文所述,尽管日本高职教育机构多样,但能大规模承担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任务的高职学历教育存在缺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专门职业大学是日本构建现代化高职教育体系的坚实一步。

(四)专门职业大学产生的契机:“政策之窗”开启

在多源流分析框架中,大部分时间里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是彼此独立的,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汇集,此时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28]。“政策之窗”被打开标志着政策问题被关注和破解、提出的建议被认可和吸收,制定政策程序启动,相关政策正孕育而生。

2017年日本修正《学校教育法》标志着3条源

流最终实现结合,政策之窗被成功打开,由此,专门职业大学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29]。依照有关法律条令,专门职业大学有三大显著特征,第一,以培养实践应用能力为导向,强调专业理论素养。该类学校将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优势相结合,在开展技能教育的同时强化学生专业理论和相关领域内容学习,着重开发学生的实践力和创新力^[30]。第二,切实加强与企业联系,突出产学研协同。一是体现在确保实践与研究能力兼备的教师在“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的比重,规定全职教师中40%以上的老师在行业产业具有5年以上事务经验与能力,并且这一部分教师中保证一半以上兼备研究能力。二是体现在将实习环节的学分要求提高至总学分的30%~40%,且其中必须包括亲临企业的“临场实务实习”(臨地実務実習)。第三,设置在大学框架中,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并重。专门职业大学修业年限为4年,毕业生可以获得“学士(专业)”学位,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有同等升学机会。可以说,专门职业大学是以培养学生承担专门职业所需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能力为目标,开展一种既专于实操技能又涵于理论素养、既精于专业知识又博于宽领域内容的教育。2019年4月日本高知康复专门职业大学(高知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専門職大学)和国际时尚专门职业大学(国際ファッション専門職大学)率先开始招生,预计2020年还有20多所学校相继开设。

四、优化路向:专门职业大学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专门职业大学制度的形成有其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相互作用和松散耦合下,由修正《学校教育法》等一些关键事件助推的结果。在正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日本,专门职业大学是日本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试验,被日本寄予承担起高层次、实践性、创造性的职业教育的任务,其成效如何还有待继续关注和研究,但该制度的产生对解读日本未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为我国带来一定启示和借鉴。

(一)有效衔接职教层次,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建设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首先需要加强不同层级教育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即加快构建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体

系。日本设置专门职业大学弥补了其高等教育机构职能的缺位,实现了功能互补、错位竞争,贯通了各层级职业教育体系。现如今,职业教育高等化是趋势,高等教育教育多样化同样是共识。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本科院校可结合实际加大对高职生的对口招生,以打通职教生的升学渠道促进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政府层面应在积极引导一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同时,厘清不同类型高校的职能任务,通过在部分高职院校试点实行学位制度建设学制立交桥^[31],贯通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级层次,构建学士、硕士、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

(二)提升高职教育水准,打好专业课程新底色

职业教育以技术知识为基础,主要帮助学生解决“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高等职业教育在此基础上应着眼其高等性。未来高职教育一方面不仅要面向社会需求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还需要通过厚植职教生的学术基础,加强学理性内容的学习,促进劳动创新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需要继续突出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群设置上需围绕个体发展需求并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根据修订的《大学设置基准》,专门职业大学对接日本“社会5.0”战略,主要面向医疗、美容、旅游、信息领域^[32],对中国而言,可以重点把新一代信息产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新材料等中国制造业十大领域作为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的依据,充分挖掘高职院校和区域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

(三)强化产教深度融合,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

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就业市场,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产业界的需要,就会成为痼疾。日本专门职业大学着力加强与地区和产业界的合作,在规定双师型教师队伍配置的同时加强实践训练,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体制建设。我国在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时,首先应将实践性课程和就业实习等更多地纳入培养环节,促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服务社会相结合。其次,高职院校应主动与行业内领先企业合作,将更多行业精英吸引到高职教师队伍建设中,搭建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平台,增强校企之间信任感。实际上,高职教育不仅直接对接产业发展,还能带动区域经济,是稳增长、促就业的有力工具。因此未来高职教育需继续为拓展服务范围,充分发挥

在区域内的引领示范作用,打造学校、企业、区域三方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四)结合终身教育理念,贯通国民教育两维度

长期以来,用工具理论来解释职业教育占有主流地位^[33],诚然,高职教育需要服务经济发展需要,为社会输送专门技术人才,但首先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它最根本的任务还是在于促进人的发展。高职教育应更加注重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教育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平衡。我国在2019年5月印发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未来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生源都将成为高职教育的潜在目标群体,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学习基础和学习需要,因此,在入学招生、课程与教学、学制的规划与设计上需要注意多形式、多空间、多层次以满足个性化需求。要将高职教育向上向下衔接,从纵向视角满足各类学生继续深造和生涯发展的需求,为职教人才提供学历证明和资格认证;从横向视角推动社会人士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将高职学校教育与企业实习培训相互融合。由此,高职教育将人一生中所受教育的两个维度加以贯通,对打造学习型社会和建设终身学习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26]陆素菊,寺田盛纪.在经济性与教育性之间: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与未来走向——陆素菊与寺田盛纪关于职业教育发展中日比较的对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2):151-156.
- [2]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A/OL].(2019-02-13)[2020-02-0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A/OL].(2019-03-29)[2020-02-02].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0/23/content_5443966.htm.
- [4]刘鹤根,张春晗.当前高职院校改革发展需把握好的五个问题刍议[J].高教探索,2019(10):82-88.
- [5]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2.
- [6][28]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35,155.

[7]杨冠琼.公共政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0,142.

[8][23]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六国技术教育史[M].李永连,赵秀琴,李秀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9.

[9]邱小云,贾微晓,彭迪云.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及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借鉴[J].东南学术,2018(2):129-135.

[10]e-Stat政府统计综合窗口.就業構造基本調査平成29年就業構造基本調査-全国編人口・就業に関する統計表[EB/OL].[2020-02-02].

<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222459>.

[11]藤原洋.第四次工业革命[M].李斌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6.

[12]e-Stat.人口推計平成30年10月1日現在人口推計-年齢(5歳階級),男女別人口及び割合-総人口[EB/OL].[2020-02-08].<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312314>.

[13]文部科学省.教育振興基本計画[EB/OL].[2020-02-08].https://www.mext.go.jp/content/1406127_002.pdf.

[14]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93.

[15][16]文部科学省.実践的な職業教育を行う新たな高等教育機関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審議のまとめ)[EB/OL].[2020-02-07].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koutou/061/gaiyou/_icsFiles/afiedfile/2015/04/15/1356314_1.pdf.

[17]文部科学省.教育再生会議の設置について[EB/OL].[2020-02-07].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4/003/gjjiroku/attach/1416265.htm.

[18]首相官邸.教育再生実行会議-今後の学制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EB/OL].[2020-02-07].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youikusaiei/pdf/dai5_1.pdf.

[19]经济产业省.新産業構造ビジョン[EB/OL].[2020-02-07].http://www.meti.go.jp/committee/summary/eic0009/pdf/018_02_00.pdf.

[20]安培.日本“工业4.0”与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7):28-32.

[21]文部科学省.個人の能力と可能性を开花させ、全員参加による課題解決社会を実現するための教育の多様化と質保証在り方について[EB/OL].[2020-02-09].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_icsFiles/afiedfile/2016/10/24/1371833_1_1_1.pdf.

[22]金双鸽,梁晓清.日本企业内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5(36):30-31.

[24]中野贵比吕.我が国における能力開発の現状-個人の能力開発、企業における人材育成のあり方に関する実証分析[EB/OL].[2020-02-15].<https://www5.cao.go.jp/keizai3/discussion-paper/dp064.pdf>.

[25]中野贵比吕.我が国における能力開発の現状-個人の能力開発、企業における人材育成のあり方に関する実証分析——付図・付表[EB/OL].[2020-02-15].<https://www5.cao.go.jp/keizai3/discussion-paper/dp064z.pdf>.

[27]文部科学省.学制百年史-高等専門学校制度の創設[EB/OL].[2020-02-08].https://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7823.htm.

[29]文部科学省.学校教育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抄)[EB/OL].[2020-02-08].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icsFiles/afiedfile/2018/07/30/1407675_01.pdf.

[30]文部科学省.専門職大学等の概要・特色[EB/OL].[2020-02-09].<https://www.mext.go.jp/menu/koutou/senmon/1387235.htm>.

[31]陈恒敏.“金砖国家”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域外四国的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10):19-28+36.

[32]大学・短期大学・専門学校の進学情報サイト.スタディサプリ進路(大学・専門学校)[EB/OL].[2020-02-08].<https://shingakunet.com/net/fwSearch/list?keyword=%E5%B0%82%E9%96%80%E8%81%B7%E5%A4%A7%E5%AD%A6&x=40&y=7&koshuCategoryLCd=&isParent=false&isGakkoTop=false>.

[33]闫广芬,咸桂彩.发现职业教育更广泛的投资价值——基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投资回报评估框架[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1):107-112.